

“暴露與諷刺”論爭中的郭沫若和茅盾*

白永吉**

關於抗戰初期在國統區文學界開展的所謂“暴露與諷刺”論爭，1980年代以來由於一些研究已提出了既往評述上的有些問題而進行了多方面的探討。其重要成果可以概括為這場論爭不一定是國統區左翼和右翼文學界之間的爭論，也不只是對抗國民黨文藝政策的鬭爭。¹⁾ 其中值得注目的是，將這場論爭的焦點集中到現實主義“暴露與諷刺”方法的究明方面，還從“真實性與傾向性統一的問題”的角度來得出了論爭的意義的研究成果。²⁾

儘管如此，至今的研究對於成了這場論爭的契機的張天翼《華威先生》在日本被翻譯介紹的具體情況，以及在左翼文學界內部呈現的抗戰文學運動論與文藝思潮上的某種分歧等的問題，不能說已經充分地闡明。特別要指出，至今的研究幾乎忽視這次論爭裏隱含的，作為左翼文學界的中心文學家茅盾和郭沫若之間，對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實踐方向問題上的糾葛要素。

從這樣的問題意識，小論要再一次探討“暴露與諷刺”論爭的展開過程，特別通過對茅盾和郭沫若兩人的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抗戰文學論的對比考察來闡明這場論爭在抗戰期文學史上的意義。³⁾

* 이 논문은 2005학년도 고려대학교 교내 특별연구비에 의해 연구되었음.

本論文曾在中國郭沫若研究會國際學術討論會(2005.8.16)上宣讀。

** 高麗大 中文科 教授

1) 關於對這場論爭的從前評述上的有些問題以及論爭開展的整個過程的詳細分析，參見蘇光文：《“暴露與諷刺”仍舊需要——關於《華威先生》所引發的論爭》，《重慶師範學院學報》1981年第3期；後收《大後方文學論稿》，西南師範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的《文學與生活：“暴露與諷刺”討論》部分。

2) 參見：溫儒敏，《關於“暴露與諷刺”的討論》，《新文學現實主義的流變》，北京大學出版社，1988年版。

3) 小論是基本上根據既有的拙稿《“光明と暗黒”論争における茅盾—《華威先生》の評價をめぐって》(《早稻田大學文學部研究紀要別冊文學、藝術學編》第14集，1987年)的主要內容重新改寫的。

如所周知，張天翼的短篇小說《華威先生》發表於1938年4月茅盾創辦的《文藝陣地》創刊號上，而“暴露與諷刺論爭”就是由這篇作品引起的一場持續兩年之久的爭論。圍繞對《華威先生》的評價問題展開的這次論爭最初階段的焦點是，小說的人物形象所體現出的對國統區抗戰陣營中的黑暗面的暴露與諷刺，是否有損於抗日統一戰線政策的實踐。以這種焦點為中心，論爭的過程中提出了種種問題，如面對抗日戰爭的作家的基本態度、作品對讀者的影響、諷刺文學的性格等問題。

對於《華威先生》的最初評論應該是林煥平發表的文章。他首先歡迎《文藝陣地》的創刊，認為這是上海陷落後散亂的“文藝陣線”的“重建”。在此，林煥平特別注目茅盾要求“把現實生活的種種經過綜合分析提煉，而典型地表現出來的”作品的現實主義編輯方針，對《華威先生》加以肯定評價指出“它表現了一個救亡要人的典型”。總之，他認為在抗戰中像《華威先生》這種典型的人物實在不少，因此張天翼的小說無疑“正是給他們一個有力的諷刺”。⁴⁾

與林煥平的這樣肯定的評價正相反，有些論者從作品給讀者帶來的惡劣影響的角度來對《華威先生》提出了否定的意見。例如，李育中把救亡運動看作革命鬭爭的一環，對這篇小說的暴露與諷刺的創作傾向，如此批判：“在緊張的革命行進和作生死決鬭的時期，嚴肅與信心是異常需要的，接受幽默的余暇是太少了，何況幽默有時出了軌，會鬧亂子的，傷害着嚴肅的。”⁵⁾在此，李育中不用作為批判現實社會矛盾的武器的用語“諷刺”而特意用“幽默”，似乎已經表示對《華威先生》的一種否定評價。

可更值得注目的是，對於救亡運動，就是說對於統一戰線組織活動的李育中的認識和姿勢。對他來說抗日戰爭的實行，不外是攸關民族生死的鬭爭，也是革

4) 林煥平，《讀《文藝陣地》》，《救亡日報》1938年4月24日。引自林煥平，《抗戰文藝評論集》，民革出版社，1939年版所收的《讀《文藝陣地》的創刊號》。

5) 李育中，《幽默、嚴肅和愛——讀張天翼的《華威先生》》，《救亡日報》1938年5月14日。引自蘇光文編選，《文學理論史料選》，四川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228頁。

命的過程。根據這種立場來看，正因為持續抗戰就具有追求光明的意義，拘泥於其中的黑暗應該作為缺乏歷史意識的消極態度加以批判。令人感興趣的是，李育中的這種觀點其實基於對現實主義批判功用的消極評價，或者對浪漫主義向往革命理想的一種擁護。如下的主張就是最好的說明：

人們凝視現實，不只要看清楚這現實，而更是需要看到現實以上的，從現實的根據上，預見了光明的未來，這樣藝術的理想成分和嚴肅性是需要提出來了。……

所以作家暴露了黑暗，還是不夠，而是需要在這無邊的黑暗中帶來強烈的光明，惟有光與熱才能把人類引向前去的。浪漫主義與現實主義的統一，應從這裏邊去理解。自然主義誠然是不錯的，可是終於要較遜一籌。……⁶⁾

那麼，如果李育中的文學論或者現實認識起因於抗戰初期一部分年輕文學人共有的要參與抗戰活動的緊迫感的話，在抗戰文化統一戰線上占有中心地位的中堅文學人們的文學運動論是怎麼樣的呢？在此，以當時作為第三廳廳長的資格在國共合作的接點上活躍着，又在黨內被決定為“魯迅的繼承者，中國革命文化界的領袖”的⁷⁾，郭沫若的包括《抗戰與文化》在內的抗戰文化論及其文學論為一個例子來探討。

郭沫若在這些文章裏主張，在實行全面抗戰的文化活動當中最要緊的是民衆動員的工作，而關於其具體的實踐方向，這樣說：

抗戰所需要的是大衆的動員，在動員大衆上用不着有好高深的理論，用不着有好卓越的藝術——否，理論愈高深，藝術愈卓越，反而越和大衆絕緣，而減殺抗敵的動力。……一切文化活動都集中在抗戰這一點，集中在於抗戰有益的這一點，集中在能够迅速地并普遍地動員大衆的這一點。⁸⁾

即郭沫若主張：抗戰文化活動上最核心的既然是“抗戰到底，最後的勝利必屬於

6) 在這一文中，李育中對老舍的抗戰期文學活動，也從同一的角度來如此評價：老舍先生自抗戰以後，無論在氣質和作品上面都改變許多了，他發狂地工作，成爲一個浪漫主義的擁護者，好容易就是一個群衆中的作家。這樣的老舍，他的前途更無可限量了。同上，228，229頁。

7) 依靠吳奚如的回顧，1938年夏，黨中央根據周恩來的建議作出黨內決定，奠定了郭沫若的文化界領袖的地位。參見：吳奚如，《郭沫若同志和黨的關係》，《新文學史料》，1980年第2期。

8) 郭沫若，《抗戰與文化》，《自由中國》第1卷第3期，1938年6月20日。引自《抗戰與文化問題》，《郭沫若全集》（文學編）第18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92年版，219頁。

我的很簡單的理論，而實際上大眾需要這種理論，那麼批評家的任務就是為了使大眾習慣於這樣的理論，把它反復地普及於他們，直到大眾能“無條件反射”地接受這種理論。當然，郭沫若的這種見解是站在統一戰線政策的立場，在解決政治課題的前提下提出的，帶有廣泛文化運動論的性質。可是其結果，不能否定這篇文章呈現出對文學相對獨立性或藝術性的忽略傾向，換句話說，有一種對於抗戰文化運動當中文學應該帶有的獨自作用，幾乎置之度外的傾向。

其實這樣的見解，似乎基於對文學作品的藝術性和宣傳性的一種二元式想法，而且與特別注重宣傳性的結果也不是沒有關係的。如下的論述，進一步闡明了他的主張。

但文藝是宣傳，這是所謂“實如”(sein)，是事實；而宣傳當切於人生，則是所謂“當然”(soll)，是價值。價值是須由人力來創造，來策進的。我們既經知道，在抗戰中，凡能集中力量於抗戰有益的文藝部門和作風，大都受着鼓舞而作家們的努力於無形之間有趨於統一的傾向，我們便當策進這種傾向，使之愈受鼓舞而實行統一。⁹⁾

在此，郭沫若把宣傳活動看做倫理道德與價值取向的實踐行為，所以他極力主張抗戰期文學藝術應該成為使一切力量集中於抗戰有益的宣傳之一環。¹⁰⁾可是值得注意的是，郭沫若的這些文章對於作為抗日戰爭的主體的民衆身上蘊藏的歷史性意義，或者籠罩着他們的社會體制上的黑暗面，出乎意料地並不當作問題。其實，郭沫若的這些抗戰文化論引起了批判也與這種立場有一定關係。比如說，胡風對郭沫若的文章批評說：在持久戰中的文化運動上只爲了“人民底初步的政治覺醒”的文化普及工作和“無條件反射”的宣傳活動，不外是阻擋“人民底對於政治遠景的堅信”的一種“公式主義”的想法。¹¹⁾從這種角度來看，對“暴露與諷刺”論爭中的矛盾文學論的穩當的理解，可以說也就與統一戰線政策實行過程當中的對民衆的認識問題有密切關係。

9) 郭沫若，《文藝與宣傳》，《大公報》，1938年3月27日，引自《郭沫若全集》(文學編)第18卷，250頁。

10) 不用說，“文藝是宣傳”的概念是在1920年代末的革命文學論爭當時引起後期創造社的年輕文學人們到革命鬥爭中去的戰略性口號。從這種角度來看，抗戰初期郭沫若的“文藝是宣傳”的命題，可以算是具有1930年代左翼革命文學的口號再一次活用在抗戰時期民族統一戰線政策的意義。

11) 參見胡風《要普及也要提高》，《國民公論》第3期，1938年10月。引自《胡風評論集》中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84年版，46-51頁。對胡風的批評，郭沫若也又寫了反駁文章：《“無條件反射解”》，《文學月報》第2卷第1、2期合刊，1940年9月。後收《郭沫若全集》(文學編)第18卷。

二

與“暴露與諷刺”論爭有直接關係的茅盾的評論文章當中，首先值得注目的是《論加強批評工作》。這一文的重點，如常被引用的那樣，放在指出“抗戰的現實是光明與黑暗的交錯，一方面有血淋淋的英勇的鬪爭，同時另一方面又有荒淫無耻、自私卑劣”的現實的兩面性。就是說，不消滅蹂躪民衆的黑暗面，抗戰中國的“最後勝利”不能“爭取”的作家意識，可以算是這篇文章的核心。在此，茅盾對於不能看透現實社會的這種矛盾而只注重加強最後勝利信念作用的宣傳活動的抗戰初期文學運動加以批判，如此說：

最後勝利之確信，不能用“定命論”的地宣傳就能使人民大眾信從的，而且也不應該“定命論”的地宣傳。最後勝利須待“爭取”。一篇文藝作品如果只寫了抗戰的光明面，則雖有加強最後勝利信念，但“爭取”的意義是沒有了。這樣的“加強”會誘引起“定命論”的盲目的樂觀，而盲目的樂觀在現實的打擊下往往會一變而為無條件的悲觀。¹²⁾

茅盾的這篇文章，不能斷定為對上述郭沫若的《抗戰與文化》所表明的文學運動論的反駁評論。（但是，因為郭沫若的文章剛發表了一個星期以後茅盾的這一文脫稿，不一定沒有這種可能性。）儘管如此，在抗戰活動上對文學的作用以及民衆觀等的方面，兩個人的見解呈現出非常鮮明的對照也很明白。其實，與抗戰初期站在民族統一戰線的中心位置上活躍的郭沫若相反，茅盾對文藝界統一戰線活動所取的可以說是一種保留態度。如下的有關回顧抗戰初期的文章，就是其好的反証。

……聽說董老（指董必武——引用者）在漢口，我就去拜訪了他。董老了解了我的來意

12) 茅盾，《論加強批評工作》，《抗戰文藝》第2卷第1期，1938年7月。引自《茅盾文藝雜論集》下集，上海文藝出版社，1981年版，739頁。但，這篇文章的執筆日子是1938年6月27日。

後却先問我願不願意留在武漢，因為正在籌組的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和政治部第三廳都需要人。我說，做這種工作我是外行，我還是去編我的雜誌寫我的小說吧。

……創辦《文藝陣地》是鑒於當時的抗戰文藝雖也轟轟烈烈、熱熱鬧鬧，但總覺得缺乏深度，既沒有在理論上對各種新問題作認真的探討，也沒有在創作上對現實生活作嚴肅深刻的發掘。所以，想辦一個刊物來做這方面的工作。……因此一開始，我們就確定《文藝陣地》是個戰鬥的文學刊物，是個堅持現實主義傳統的文學刊物。¹³⁾

這樣的表述裏邊，似乎很好地呈現出作為五四以來構築現實主義傳統的一個文學人的自負心，以及對文協和第三廳等統一戰線文化組織的文學運動成果的某種批判態度。總的來說，茅盾對於抗戰初期統一戰線政策及作為其一環的由左翼文學界的抗戰文學運動展開方式，似乎站在保留或者反對立場上。《文藝陣地》的創刊所「暴露與諷刺」論爭的發生，也可能起因於茅盾的這種立場。

如此，圍繞着《華威先生》的評價問題上提出來的評述當中，茅盾的一系列評論不但對這一次論爭具有導向作用，而且在抗戰初期對現實主義認識的深化方面也起了重要的作用。比如說，他在《八月的感想》一文中指出：從“注重寫事”的傾向到“注重寫人”的轉變就是1938年上半期文學運動的成果，而《華威先生》那樣典型的創造就成為了“對於隱伏在光明中的丑惡的研究和搜索”的新趨向的契機。¹⁴⁾再如溫儒敏所指出的那樣，通過這場論爭，“茅盾就注意到暴露黑暗也有感情判斷和傾向性問題。他強調，寫黑暗必須灌注作家強烈的情感，要有重點與傾向性，而不是展覽黑暗。”¹⁵⁾因此，茅盾說：

對於丑惡沒有強烈憎恨的人，也不會對於美善有強烈的執著；他不能寫出真正的暴露作品。同樣，沒有一顆溫暖的心的，也不能諷刺。悲觀者只能詛咒，只在生活中找尋丑惡；這不是暴露，也不是諷刺。沒有使人悲觀的諷刺與暴露。¹⁶⁾

13) 茅盾，《烽火連天的日子——回憶錄(二十一)》，《新文學史料》1983年，第4期；《在香港編《文藝陣地》——回憶錄(二十二)》，《新文學史料》1984年，第1期。

14) 茅盾，《八月的感想——抗戰文藝一年的回顧》，《文藝陣地》第1卷，第9期，1938年8月。

15) 參見：溫儒敏，《新文學現實主義的流變》，173頁。

16) 茅盾，《暴露與諷刺》，《文藝陣地》第1卷，第12期，1938年10月。

總的來看，“暴露與諷刺”論爭中茅盾的這些文章，不用說是從五四以來他所探索過來的現實主義文學論的角度，把內在於抗戰初期文學運動裏邊的問題分析出來的結果。即把現實主義文學所要求的既要有對向往光明的“歷史必然性”的認識，也要與現實黑暗性格鬪，并在其克服過程中確認或証實的文學信念，隱含在這些文章裏邊了。總之，茅盾注意到一部分文學人們安逸的姿勢和文學運動的方向：以抗戰初期興奮的氛圍為背景，要把抗戰的熱情直接聯系到最終勝利的目標。而這些文章不外是對這種傾向的尖銳的反駁。

三

“暴露與諷刺”論爭以日本改造社發刊的《文藝》(1938年12月號)雜誌上由於增田涉翻譯的《華威先生》被登載介紹為契機，進入了新局面，這就是所謂“《華威先生》的出國”。關於這次《華威先生》的“出國”，藍海的《中國抗戰文藝史》就這樣記述：

《華威先生》的“出國”，是論爭更加深入的階段。一九三八年十一月，日本《改造》雜誌刊載了《華威先生》，并在編者按語中詆毀中國的抗日工作者和中國人民，以鼓動日本侵略者的“士氣”，這便引起文藝界更為廣泛熱烈的討論。¹⁷⁾

1938年12月，由改造社發刊的《文藝》雜誌12月號上譯載了的《華威先生》，如何作為1938年11月《改造》雜誌的信息來傳到中國呢？其事情的經過并不清楚。只是，翻譯者增田涉把《華威先生》譯載於《文藝》12月號之前，在同一雜誌的11月號上以《最近支那文學界消息》的標題來關於當時中國文學界的主要情況進行介紹過，而在此也觸及《文藝陣地》創刊的消息和《華威先生》的情節。這樣的經過似乎與中國方面的反應有某種關係。盡管如此，引發“更為廣泛熱烈的討論”

17) 藍海，《中國抗戰文藝史》，山東文藝出版社，1984年版，340頁。

的開端的論文是林林的《談〈華威先生〉到日本》。在這一文中，林林說：

現在，看日本報，《華威先生》，是到日本去了，在《改造》十一月號，有日本作家翻譯過去。這樣內容的作品，被翻譯是不是有影響呢？當然是個問題。我以為譯者並不是存心是介紹中國抗戰文學的好作品給日本讀者的，而是介紹給讀者：看中國在抗戰中有這樣幹不出所以然的幹部人物。而得一種輕蔑對方的快慰。……他出現在日本讀者的面前，會使他們更把中國人瞧不起，符合着法西斯主義的宣傳，而增強他們侵略的信念。一句話：我們是“滅自己的威氣，展他人的志氣了”。¹⁸⁾

即林林認為：“在神聖的民族解放的戰爭中”，雖然有一些部分的否定方面，“但無論如何，在錫光方面，比之暴露黑暗方面，是來的占主要的地位的”。總之，林林拘泥於《華威先生》被敵國日本利用為反宣傳資料的結果論，似乎從總體來正視中國現實的觀點相對弱化了，而這種立場也直接聯系到對《華威先生》的否定評價。

可林林是當時受到共產黨領導的《救亡日報》實際編輯的一個人員，被認為該社社長郭沫若“生活的助手”的共產黨員作家兼日本專家。¹⁹⁾因此，他的見解可以看做基本上反映着以《救亡日報》為中心的左翼文學界對《華威先生》的評價。換句話說，把圍繞着統一戰線政策實踐方向的，在左翼文學界內部存在的意見相反的一個側面，林林的這一文可以說是明確地呈現出的。那麼，由於增田涉的《華威先生》的翻譯和介紹的實際內容到底是怎麼樣的呢？

其實，增田涉已經通過魯迅與茅盾有交流，對張天翼的文學也持有比較深入的理解。例如，在《文藝》11月號的《最近支那文學界消息》上，他對茅盾的《文藝陣地》說：“自由主義的作家茅盾”到廣東去編輯的《文藝陣地》等“被認為具有相當豐富的形式和內容”。只是，在這個階段他似乎還沒能直接看到《文藝陣地》，概括了《華威先生》的部分幾乎依靠着上述的林煥平對《華威先生》評價的內容。如此看，他算是按照在“暴露與諷刺”論爭中對茅盾的文學論有同感而主張“暴露黑暗”的文學人們的見解來評論《華威先生》。所以也可

18) 林林，《談〈華威先生〉到日本》，《救亡日報》1939年2月22日。引自蘇光文《文學理論史料選》，240-241頁。

19) 關於當時林林在《救亡日報》上的工作情況以及與郭沫若的關係，參見：胡仰曦、崔琦《林林的生平與創作》，《日本學論壇》2003年第4期。

以說，增田涉把《華威先生》的肯定側面比較忠實地介紹到日本。

其次，引起了中國方面非難的《文藝》12月號登載的“譯者後記”(並不是“編者按語”)的內容是怎麼樣的? 儘管稍微長一點，還是引用全文。

日支事變以來，支那的文學全是所謂“抗戰文學”，都是夸大地、炫耀威勢地、荒唐地寫着他們多麼勇敢地抗戰。這時出現了《華威先生》，引起喧嚷的爭論了。因為這個《華威先生》是一篇把內部的丑惡面暴露了出來的小說。把事件描寫為勇猛和出色的也可以，可還是應該抱更有真實的憎惡來暴露出內在於他們社會的丑惡，比只有口頭上的勇猛和出色，更加正視現實吧，文藝永遠是批評的——這就是他們一派的主張。不管怎樣，張天翼竟把在戰敗支那內部的丑惡如此大胆地描寫，可以說是持有認真的勇氣，盡管這篇作品作為藝術的优劣姑且不談。(日支事變以來，支那的文學是所謂「抗戰文學」の一色で、彼等がいかに勇敢に抗戦したかといふやうなことを誇大に、威勢よく、出たために書くことばかりだった。そこへ「華威先生」があらはれて器器の議論を投じることになった。この「華威先生」といふのが内部的醜惡面を暴露した小説だったからである。事件を勇ましく立派なものとして描くもいいが、それよりもつと眞實なる憎惡を以つて彼等の社會に内在する醜惡を暴露すべきだ、「言葉」だけの勇ましい、立派なことよりも、もつと現實を直視せよ、文芸は永遠に批評のものだ—といふのが彼等一派の主張である。何れにせよ、張天翼が敗戦支那における内部的醜惡をかくも大胆に描寫したといふそのことは、眞面目な勇氣があるといつていいであらう、この作品の藝術としての優劣はともかくとして。(譯者記))

當然，這一文中對正在執行抗日戰爭的中國現實叫做“戰敗支那”云云的地方，不能不說是反映在當時日本對中國的整個歪曲的認識而已。儘管如此，增田涉對《文藝陣地》及《華威先生》的評價本身，大體上保持其客觀性的事實也似乎不能否定。另外，根據有位日本研究者的分析，包括增田涉在內的當時日本《文藝》雜誌的編輯人員，其實在嚴酷的檢閱統制之下盡力堅持“對於日本戰時體制的抵抗意識”，介紹中國作家作品的行為也能解釋為這種“抵抗意識”的見証。²⁰⁾

如此看來，在以《華威先生》的出國為契機提出的林林等的對《華威先生》的批判裏，可能也有為了鼓吹抗日意識，故意使《華威先生》的出國事件擴大為反宣傳資料的意圖。反正，這裏成問題的是，以後在左翼文學界內部展開的論爭的推移和

20) 參見：弓削俊洋《〈華威先生〉の訪日—日中戰爭下の文學交流と“非交流”》，《愛媛大學法文學部論集文學科編》第23號，1990年。

其內容。總的來說，主要在1939年裏展開的論爭通過對林林等的《華威先生》評價中存在的問題的批判性討論，論辯的焦點大概集中到重新肯定現實主義精神的方向。比如說，像作家的張天翼所主張的那樣，《華威先生》的發表是為要中國自身更健康的一種“自我批判”的一環，所以這篇作品被介紹到日本也可能會得到使“日本被壓迫的民衆”自覺到他們帝國主義體制矛盾的結果，這種認識的獲得就是其一個例子。²¹⁾

四

以“《華威先生》的出國”為契機展開的“暴露與諷刺”論爭，在左翼文學界內部大致獲得共識以後，由於國民黨方面右翼文學界的問題提出，還持續到1940年10月左右。²²⁾關於以國民黨直系的中國文藝社《文藝月刊》等為中心開展的又一階段論爭的推移，這裏避開詳細論述。只是，要指出中國文藝社在文協成立過程中是起到了一定作用的，它是站在統一戰線組織的接點上的出版社。²³⁾“暴露與諷刺”論爭就是在含有那麼複雜的內部矛盾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之下，如何才能達到抗日戰爭最後勝利的目標，圍繞着這種艱難的歷史性課題而進行的一場論戰。

如果從這樣的角度來，考慮到茅盾創辦《文藝陣地》的意圖以及與國統區共產黨領導組織的交涉過程的話。當時茅盾的文學運動論和《文藝陣地》基於“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的立場，“體現了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和國防文學兩個口號的并存和統一”的事實似乎很分明。²⁴⁾拒絕了現象的向光明的出路而要凝視潛在於其表層裏面的黑暗，以此作為作家的氣質。“暴露與諷刺”論爭就以茅盾的這種現實主義精神為中心

21) 參見：張天翼，《關於《華威先生》赴日—作者的意見》，《救亡日報》1939年3月15日。引自蘇光文《文學理論史料選》。

22) 參見：注①的蘇光文論文

23) 關於文協成立過程中中國文藝社的作用以及與國民黨的關係，參見：杉本達夫，《文協の成立》，《中國文學研究》，第10期，1984年12月，早稻田大學中國文學會刊；後收《日中戰期の老舎と文藝界統一戰線—大後方の政治の渦の中の非政治》，東方書店，2004年版。

24) 參見：《茅盾在香港和桂林的文學成就》，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3頁。

軸來展開，而由於隨着持久戰的內部矛盾的深化，在這場論爭中矛盾的現實認識和現實主義論，也可以說再確認到其客觀正當性。

與此同時，這場論爭對於郭沫若來說，也成爲了構築起抗戰文學運動論而具體體現浪漫主義文學精神的過程。不用說，這時期郭沫若的基本態度是站在通過國共合作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立場，積極推進追求抗日戰爭的持續展開和最終勝利的，也可以說在其過程中他一貫保持爲了掌握左翼文學以及中國共產黨的主導權的宏觀展望。另一方面，在抗戰文學運動中體現這種認識的時候，他所堅持的文藝思潮上的特征就是五四以來一直追求過來的，把自我擴張到民族的浪漫主義傾向。

這時期他的文章中，從有一文《把有限的個體生命融化進無限的民族生命裏去》的題目自身中激情地表露出來的核心內容，如果離開五四以來不斷深化的要把自我和民族或革命成爲一體化的浪漫主義體現模式的話，恐怕不容易理解。又同一文章的結尾部分的“死一個頂有價值的死吧”的呼吁，也不能被解釋爲大衆演講上的單純修辭，而應該從要把個體的存在意義昇華到祖國或革命理想的一種浪漫主義“自我擴張”或者“死的美學”的脈絡上體會。

當然，抗戰初期郭沫若的文學論中表現出的這種浪漫主義，與通過對生命的有限性和死的存在性提問來追求純粹的神性或超驗的終極關懷的“美學的浪漫主義”，應該有所區別。嚴格說來，抗戰時期郭沫若的浪漫主義畢竟屬於由“英雄主義”、“獻身精神”及“夢想的實現”等構成的，爲了政治鬭爭服務的一種“政治學的浪漫主義”的範疇。²⁵⁾另一方面，也可以說郭沫若的這種浪漫主義，含有在德國後期浪漫主義裏顯出的“由民族精神造成的向超個人之文學的轉向”²⁶⁾的傾向。

如此看來，在“暴露與諷刺”論爭中對《華威先生》的諷刺性持有批判性觀點的有些論者的文章，也可以說基本上帶有所謂積極浪漫主義或者革命浪漫主義的性質。如前述李育中的論文中提出的，“從現實的根據上，預見了光明的未來”或“藝術的理想成分”等的內涵，就是其好的例子。換句話說，這場論爭中對《華威先生》加以否定評價的這些文學人，可以算是屬於以郭沫若爲中心的革命浪漫主義的流派。

反過來看，在這次論爭中包括茅盾在內的對《華威先生》加以肯定性評價的論者

25) 參見：俞兆平，《美學的浪漫主義和政治學的浪漫主義》，《學術月刊》2004年，第4期。

26) 池明烈，《獨逸浪漫主義研究》，一志社，1975年版，62頁。

們，也可以說通過論爭獲得了對於現實主義的深入認識。例如，在一篇有關文章中周行主張：在暴露黑暗的文學作品創作過程中更需要“藝術的真實與現實生活的統一”。他特別強調現實主義文學一定要究明又發掘黑暗的“社會的根源”和“內在原因”，以使讀者把握黑暗消滅的必然性，能“從黑暗中看出光明”。周行還指出現實主義文學需要的不是作為旁觀者的“單純的諷喻”，而是對於人生的執著和對丑惡的憎恨。²⁷⁾

至此，“暴露與黑暗”論爭的核心爭點似乎有了解決問題的線索，因為論爭的雙方都顯示出一種越過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之間的糾葛的可能性。這不外乎對於在體現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過程上才能有兩種文學思潮的和諧統一的共識。當然，這種左翼文學的“主流”文學之內顯露的向往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發展趨向，同時就預告或隱含着與當時處於一種“邊緣”地位的，例如“美學的浪漫主義”或現代主義傾向等所謂“非主流”文學的糾葛和沖突。

總之，“暴露與諷刺”論爭是，五四以來的中國現代文學面對抗戰現實，爲了積極接受抗戰期中成長起來的民衆的力量，再一次調整文學與民衆的關係，探索抗戰文學運動推進方向的一個過程。通過這次論爭，魯迅去世後代表着左翼文學界的郭沫若和茅盾，各自以具有浪漫主義或現實主義的作家精神和價值觀，對論爭的展開過程起到了一定的導向作用。雖然其中不免呈現出有些文學論上的對立關係，以及文學思潮的多元化展開過程中的某種界限，可是1940年代中國的抗戰期文學正是通過這種對立的揚棄和克服，並深入探索下去，才具有了同時代世界文學的現代性特質。

〈參考文獻〉

《郭沫若全集》(文學編)第13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92年。

《茅盾文藝雜論集》下集，上海文藝出版社，1981年。

《胡風評論集》中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84年。

林煥平，《抗戰文藝評論集》，民革出版社，1939年。

27) 周行《關於〈華威先生〉出國及創作方向問題》，《七月》第4卷第4期。引自蘇光文《文學理論史料選》。

- 池明烈, 《獨逸浪漫主義研究》, 一志社, 1975年.
- 吳奚如, 《郭沫若同志和黨的關係》, 《新文學史料》第2期, 1980年.
- 茅盾, 《八月的感想—抗戰文藝一年的回顧》, 《文藝陣地》第1卷, 第9期, 1938年8月.
- 茅盾, 《暴露與諷刺》, 《文藝陣地》第1卷, 第12期, 1938年10月.
- 茅盾, 《烽火連天的日子—回憶錄(二十一)》, 《新文學史料》第4期, 1983年.
- 茅盾, 《在香港編《文藝陣地》—回憶錄(二十二)》, 《新文學史料》第1期, 1984年.
- 藍海, 《中國抗戰文藝史》, 山東文藝出版社, 1984年.
- 杉本達夫, 《文協의 成立》, 《中國文學研究》, 第10期, 早稻田大學中國文學會刊, 1984年12月.
- 白永吉, 《“光明と暗黒”論爭における茅盾—《華威先生》の評價をめぐって》, 《早稻田大學文學研究科紀要別冊文學、藝術學編》第14集, 1987年.
- 蘇光文編選, 《文學理論史料選》, 四川教育出版社, 1988年.
- 溫儒敏, 《新文學現實主義的流變》, 北京大學出版社, 1988年.
- 弓削俊洋, 《《華威先生》の“訪日”—日中戰爭下の文學交流と“非交流”》, 《愛媛大學法文學部論集文學科編》第23號, 1990年.
- 蘇光文, 《大後方文學論稿》, 西南師範大學出版社, 1994年.
- 胡仰曦、崔琦, 《林林的生平與創作》, 《日本學論壇》第4期, 2003年.
- 俞兆平, 《美學的浪漫主義和政治學的浪漫主義》, 《學術月刊》第4期, 2004年.

< 국문 개요 >

小論에서는 항일진 초기의 중국 國統區 문학계에서 전개되었던 이른바 '暴露와 諷刺' 논쟁을 중심으로, 이 논쟁의 전개 과정에서 보여지는 郭沫若의 낭만주의 문화론과 茅盾의 리얼리즘 문학론과의 대비적 고찰을 통해, 이 논쟁의 문예사조사적 의미에 관한 재검토를 시도하였다. 아울러 이 논쟁이 확장되는 계기가 되었던 張天翼의 《華威先生》에 관한 다양한 평가 및 일본측에서의 번역 소개 작업의 구체적인 경과를 실증적으로 재검증함으로써, 이 논쟁을 둘러싼 항전기 당시 중국 측의 항전문화 운동 전개과정상에 존재하는 일련의 문제점을 제기하였다. 그 결과, '暴露와 諷刺' 논쟁은 항전 초기 좌익 문학의 주류적 흐름에서 형성되고 있던 사회주의 리얼리즘에로의 통합적 전개 양상을 반영하는 논쟁이었음을 확인하였다. 결국 이 논쟁을 통하여, 魯迅 死後 좌익문학계를 대표하던 郭沫若과 茅盾은 항전

문학운동론상의 일련의 대립 관계를 노정함과 동시에, 그러한 대립의 지양과 극복 과정 속에서 1940년대 중국 항전기 문학이 동시대 세계문학의 근대성을 공유해 나가는 계기를 마련하였던 것이다.

關鍵詞：暴露與諷刺, 《華威先生》的出國, 浪漫主義, 現實主義